

武性康鎮安平寨

# 水滸研究与欣赏

第五辑

浙江水滸研究会编



# 水浒研究与欣赏

第五辑

浙江水浒研究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 《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五辑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成生 王明焯 方 才 卢 炘 吕立汉  
朱睦卿 吴光松 应守岩 陈心浩 陈崇清  
余锦根 余德余 季学原 赵红娟 赵明政  
徐柏松 黄岳杰 虞卓娅

主 编：马成生

副主编：余锦根 徐柏松

# 目 录

## (一)

### 论杭州的“水浒文化”

——兼评所谓《施耐庵墓志》…………… 杨 华(1)

附:李永祜先生来函

从《水浒》“王婆说风情”看宋元杭州方言…………… 杨子华(16)

### 《水浒传》成书元末明初及其“罗贯中编次”原本

概貌新考…………… 张 颖 陈 速(29)

### 无可奈何花落去 忠良渠魁皆枉然

——从两支队伍一个结局看《水浒》的

伟大现实主义贡献…………… 惠养德(50)

《水浒》创作主旨新探…………… 季学原 胡学健(64)

论《水浒传》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黄华童(73)

浅论《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 胡晓清(87)

试论《水浒》中的“招安”…………… 宋靓璟(98)

### “保国安民”,永享英名

——简评宋江“征方腊”…………… 刘庆伟(110)

简说历史上的方腊与《水浒》中的方腊…………… 丁少华(121)

试论王伦和王伦的梁山泊…………… 杨俊才(129)

试论潘金莲的悲剧及其根源…………… 冯凤仙(141)

略谈《水浒》塑造妇女形象的艺术手法…………… 陆建祖(149)

## 反贪官,反起义

- 略论金圣叹评《水浒》的基本观点兼与  
“保护色”说商榷……………程永根(155)

## 从“应试”诱入,终于“素质”提高

- 浅谈今天如何指导中学生读《水浒》  
……………金功发(163)

## 关于《水浒》诗词赏析的切入点

- 写给中师生的阅读提纲……………陈红(169)

## 以古为鉴 重视家教

- 教师、家长读《水浒》的一个着眼点 ……王苏珏(181)

## 弘扬民族文化 发扬见义勇为精神

- 《拳打镇关西》教学有感……………傅浩军(188)

- 诗两首……………**刘操南**(194)

## (二)

- 小议电视剧《水浒》……………李成方(195)

## 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改编与尊重原著的问题

- ……………应守岩(197)

- 我看电视剧《水浒传》……………李斌 余飞(201)

- 成功与遗憾……………吴光松(203)

- 杂议电视片《水浒传》……………何其民(205)

- 主题歌的评析……………莫 诩 治平(210)

- 电视剧《水浒传》观后(两则)……………竺柏岳(218)

## 王进形象的意义

- 浅谈电视剧《水浒传》对王进形象的

- “创造”…………… 汪吾金(222)
- 什么人物什么戏
- 小谈电视剧《水浒传》中对林冲结局的处理
- …………… 周 绸(225)
- 有谁能解
- 看电视剧《水浒传》的“涌金门之战”
- …………… 亚 马(227)
- 壮哉,黑旋风
- 电视剧《水浒传》改编一得…………… 陈崇清(229)
- 略论古典小说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 兼谈电视剧《水浒传》的一大遗憾…………… 陈风华(230)
- 电视剧《水浒传》摭谈…………… 陆 生(233)
- 略论电视剧《水浒传》宋江形象的再塑造…………… 傅承经(235)
- 从“徵讨正先锋”说起…………… 吴 谷(238)
- 一场虚拟的对话
- 看电视剧《水浒传》后…………… 子 初(241)
- “委屈”了古典名著
- 简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 马成生(243)
- 电视剧《水浒传》点评…………… 程 林(225)
- 如何重新塑造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形象?
- 观电视连续剧《水浒》有感…………… 张振萍(262)
- 不禁想起“文革”中的“评《水浒》”
- 电视剧《水浒传》观后…………… 丁 戊(265)
- 后记…………… 编者(269)

# 论杭州的“水浒文化”

——兼评所谓《施耐庵墓志》

杨 华

## 杭州“水浒文化”的提出

我在拙著《水浒民俗文化》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杭州的“水浒文化”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水浒》专家的赞同和肯定。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永祜先生，在读了《水浒民俗文化》之后，写给我的信中说：“我非常赞成你的看法，由于杭州是《水浒》讲说、创作、最后定型成书的中心，因此，应该大力宣传、挖掘杭州的‘水浒文化’。”李永祜先生还认为我的《水浒民俗文化》的问世，乃是“在宣传、挖掘杭州‘水浒文化’方面有了个好的开端”。

我之所以提出杭州的“水浒文化”这一观点无非是想引起杭州市一些文化部门，不仅要把“水浒文化”看作一宗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和发展，而且要把“水浒文化”与目前杭州市正在开展的“创建文化名城”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 杭州“水浒文化”的内涵之一：

### 《水浒》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

要搞清楚《水浒》作者施耐庵究竟是什么地方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靠新发现什么有关施耐庵的“家谱”、“墓志”，而是要搞清楚《水浒》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最早的版本上署的是什么名字？现存最早记载关于《水浒》及其作者的是明代高儒在嘉靖十九年

(1540)作的《百川书志》：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其实，这部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必定还要早。据竺青、李永祜两位先生考证：“这部‘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有可能早在天顺（1457—1464）之前即已存在而被高氏家族收藏。”（《〈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载《文学遗产》一九九七年第五期）。在高儒《百川书志》之后的二十六年，即嘉靖丙寅（1566），又有明代杭州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上提到这部《忠义水浒传》确是“钱塘施耐庵的本”。到了嘉靖、万历年间（1551—1600），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上也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原来，这部杭州（即武林）施耐庵编撰的《水浒传》，在当时还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畅销书和流行书呢！这无疑给高儒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由于高儒、郎瑛、胡应麟等都是与施耐庵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施耐庵是同乡，因此他们的观点就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但是，过去了五百多年后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李恭简的《兴化县续志·补遗》上，却抛出了一篇《施耐庵传》和《施氏宗谱》中题为“明人王道生”撰的《施耐庵墓志》；突然冒出了一个江苏兴化的施耐庵就是《水浒》作者的观点。对这篇所谓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何满子先生已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不论内容、文体，都漏洞百出，矛盾重重……作伪作得非常拙劣”。（1981年7月8日《光明日报》）。

我完全同意何满子先生给于所谓《施耐庵墓志》的“漏洞百出，矛盾重重”的八字评语。再如《施耐庵墓志》中提到施耐庵的五本著作，没有一部是说对的。《志余》，是没有这部书的，可能是《西湖游览志余》之误。而《西湖游览志余》乃是明代嘉靖初由杭



州人田汝成辑撰的一部介绍杭州的史实佚闻、风俗物产的地方性笔记。《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这三部书都是罗贯中的著作，怎么到了王道生的笔下却变成了施耐庵的著作了呢？至于《江湖豪客传》，据王道生的原注“即《水浒传》”。说《水浒》原名《江湖豪客传》，我们只是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里第一次见到。为什么在与施耐庵同时代的明代刊印的各种《水浒》版本以及任何一本笔记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江湖豪客传》的书名。刘冬先生还辩解说：《江湖豪客传》“为从前任何明人笔记所未见，亦无版本证明，应视为第一手资料。《江湖豪客传》更似《水浒》的原始名称，直接明朗，一看明白。《水浒》的名称则带虚意，较含蓄。”（《施耐庵生平探考》）。

其实，在所谓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出笼的三十年代，正是武侠小说盛行的时代，那时就有一位叫“平江不肖生”的写了一部题目为《江湖奇侠传》的武侠小说。因此，《施耐庵墓志》的泡制者，迎合当时的潮流，也随手编造了一个《江湖豪客传》的名字。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硬说这个《江湖豪客传》“更似《水浒》的原始名称”，“应视为第一手资料”，那就简直是海外奇谈了。

## 杭州“水浒文化”的内涵之二：

###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杭州“书会”才人

“书会”这种组织，乃是由说唱及戏剧等作者组成的社会团体。书会是那些具有渊博的文史知识、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创作人员称“书会先生”，也称“书会才人”。宋元时杭州由于“说话”等说唱艺术的发达，因此，相应的“书会”组织也较普遍，如古杭书会、武林书会便是颇具声誉的。据《武林旧事》载，当时著名的才人有李霜涯、叶庚、周竹窗等。据谭正璧先生考证，保存到现在的话本多出自宋元的“才人”之手。而且谭正璧先生还对“宋元”两

字作了这样的注解：“实际上是指南宋与元代”。（《话本与古剧》）我以为谭正璧先生的话很精辟，也很重要，正是由于宋元杭州书会才人的编撰，才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宋元话本小说。如宋元话本小说《刎颈鸳鸯会》（明杭州人洪楹编《清平山堂话本》）的结尾处，就交代这篇话本小说是由杭州书会才人秋山所编。又如《白娘子永镇雷锋塔》（《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的“入话”处就注明这本话本小说也是由“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因此，我们认为，明代的高儒所以说《忠义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便是因为《水浒》乃是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在杭州“说话”基础上整理、编撰的一个小说话本，有别于其他杭州才人记录、整理的“水浒”话本。

对于施耐庵是杭州书会才人这一观点，还可以从《水浒》中找到充分而有力的内证。如第九十四回，当说到宋江发兵攻打杭州时，有一段“说话人”口气的评述：

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

可见，《水浒》成书之前，已经有“先人书会”将艺人“说话”记录成话本，只是没有贯串起来的片段；后来又经过书会才人施耐庵等的整理、加工，才把一个个片段有机地串连起来，敷演成现在那样的关目、结构、情节。

王利器先生也认为施耐庵是一位杭州的书会才人，而且他还说：“和其他书会中人叫做什么庵一样，也起一个艺名叫做耐庵”。同时，王利器先生还引证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会艺人》中的“说经译经”艺人有戴俟庵、啸庵、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小说”艺人有俞住庵、陈可庵。《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说参请”艺人有宝庵、管庵；“说译经”艺人有载忻庵。在

引证了宋元杭州的两本笔记后,王利器先生便指出:“这些,都可以说明施耐庵与书会的密切关系”。王利器先生所引证的“说经诨经”、“说参请”、“小说”等都属于“说话”类,而施耐庵在杭州“书会”中的专业正是编撰“说话”话本的才人,又是经常与“说话”艺人来往,于是也取了个“耐庵”的艺名,这完全有可能。

作为杭州书会才人和通俗小说作家,施耐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杭州艺人说唱的“水浒故事”,如“杆棒类”《武行者》、《花和尚》,“朴刀类”《青面兽》,“公案类”《石头孙立》等的“小说”和“讲史”《大宋宣和遗事》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以致使他潜心于对这些“小说”和“讲史”进行了整理、加工和再创作,终于完成了《水浒》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演义小说,并开辟了长篇白话演义小说的先河。

作为杭州书会中的一位才人,施耐庵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说话”以外,还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也经常接触杭州其他的说唱艺术。宋元时,风行于杭州瓦子里的说唱艺术,如“小曲”、“耍会”、“慢曲”、“诸宫调”以及“平话”(即“讲史”,元时改称“平话”)等都被施耐庵作为素材写进了《水浒》。其中,描写得最细腻、最精彩的便是第五十一回的秀英演唱诸宫调《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一段。据考证,南宋杭州著名艺人张五牛创作了诸宫调《双渐小卿》,后经元代散曲家商正叔改编,并由著名艺人赵真真、杨玉娥的演唱,更使诸宫调《双渐小卿》成了当时一个最热门的说唱节目。元杨立斋在《鹧鸪天·哨遍》中盛赞:“张五牛创作似选石中玉,商正叔重编如添锦上花”,“词人老笔佳人口,再唤春风到眼前”。施耐庵在杭州听了这么精彩的诸宫调《双渐小卿》,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在编撰《水浒》时,就很自然地采用“移花接木”的创作方法,巧妙地把它移植到了《水浒》第五十一回诸宫调艺人白秀英在勾栏里演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一段故事情节中。

施耐庵不惜用一千三百多字的篇幅，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白秀英演唱诸宫调的演出场所——勾栏、戏台、乐棚；环境装饰——帐额、靠背、招牌；结构体制——打散、戏舞、欢弹、歌唱；演出程式——先由白秀英做一段“笑乐院本”（一段短小的滑稽杂剧）；再由白玉乔上场“开呵”（开场白）；后由白秀英演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由此，我们更加确信施耐庵必定是一位非但对诸宫调这种新兴的说唱艺术异常喜爱，并且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杭州书会才人；否则是不可能对白秀英演唱诸宫调的场所、装饰、体制、程式等写得这样的细致入微、生动逼真的。虽然在《武林旧事》、《梦粱系》、《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笔记中都有关于宋元杭州演唱诸宫调的记载，但都没有涉及到演唱诸宫调的具体场所、装饰、体制、程式等方面的记述。因此，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民俗史的角度看，《水浒》为宋元杭州的诸宫调艺术保存了相当珍贵、很有价值的史料。

施耐庵还从编撰话本小说的需要出发，对“人物繁盛，风俗绳厚”（《都城纪胜·序》）的杭州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民俗事象都作了非常深入的观察和丰富的积累。这无疑的为他描写《水浒》中的节令风俗提供了充分的生活素材。宋元杭州一些兼具人文特征的节令风俗，从元宵到端午、七夕、中元、中秋、观潮、重阳等都巧妙地作为衬托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而被写进了《水浒》。其中特别令人神往的要算对元宵节的描写了。作者运用了繁笔的手法，化了五千多字，前后共三次描写了元宵灯节。第一次是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第二次是六十六回元宵火烧翠云楼；第三次是七十二回“李逵元夜闹东京”。在写元宵节的风俗人情和民俗娱乐上，大至象“社火”、“舞队”、“鳌山”、“灯棚”那样的游艺活动、灯景点缀；小到如“灯球”、“闹蛾儿”、“雪柳”那样纤巧的“节物”（节日纪念品）。

对元宵灯节的描写,最精彩的便是元宵之夜在通衢大街上边行进边表演的“舞队”中的《鲍老舞》了。《水浒》中前后多次描写了《鲍老舞》。尤其是第三十三回写到清风镇元宵社火“舞队”活动中,宋江看到一伙“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使宋江不禁“呵呵大笑”。这与杭州元宵“舞队”中表演的“舞鲍老”的情景也是很相似的。由于《舞鲍老》是一种幽默风趣的民间滑稽舞蹈,在当时杭州元宵“舞队”活动中,深受观众的喜爱。据《武林旧事》“舞队”条所记,就有《大小斫刀鲍老》、《交衮鲍老》。《梦梁录》的“元宵”条下也有《踢打鲍老》。又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当时,杭州除了本地的“鲍老”之外,还有“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这些必然对热爱杭州元宵民俗和民间文艺的施耐庵产生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把在杭州元宵灯节上看到的“社火”、“舞队”、“登山”、“灯棚”、“节物”以及《舞鲍老》等都写到《水浒》里去。

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施耐庵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用方言口语写出了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这也是与他是一位杭州书会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编撰《水浒》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杭州“说话”口语化的语言传统,就如《大宋宣和遗事》里不少方言口语都被保留在《水浒》里;另一方面施耐庵又得心应手地将自己最熟悉的杭州一带的吴音方言口语运用到《水浒》里去。虽然作者有时为了刻划山东、河北等北方出身的人物的需要,也运用了一些山东、河北等北方一带的方言口语,但从总体来看,在描写人物、特别是象王婆、阎婆、潘金莲、阎婆惜这样一类小市民阶层的人物时,作者就自然地运用了为自己最熟悉的杭州一带市民的方言口语。为了语言的性格化,都让这些人物说一套非常流利的杭州一带的吴音方言口语。就以第二十四回“王婆说风情”这一回为例,就运用了如撮台山、破落户、唱喏、坐地、

耍子、婆娘、干娘、相打、伏侍、面皮、生活、一歇、道儿、菜蔬、盘缠、人家、屋里、胡梯、没脚蟹、鸭儿及鸟、晏、风、儿等流行于宋元杭州一带的吴语方言一百多处。其中有不少方言还具有明显的杭州地方性特征，至今仍保存在杭州人的口语里。由此可见，在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作者成功地描绘了一批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社会下层的市井细民，这和作者施耐庵长期生活在杭州市井细民中间，熟悉他们的生活、深通他们的语言是分不开的。这正如刘世德先生说的，施耐庵“还在书内运用了宋元时期杭州一带流行的方言土语。这都和他是钱塘人的身份符合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载《水浒研究论文集》）。

施耐庵由于是杭州书会才人的关系，使他不仅热爱杭州，而且还深深地爱上了之朝夕相处的西湖。施耐庵这种对西湖的挚爱之情在《水浒》第九十四回“涌金门张顺归神”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露。开始，作者运用了宋元杭州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清平山堂话本》）那种以诗词韵文来描绘西湖景色的手法，先是也引用了北宋苏轼的《饮湖上初晴雨后》和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邸》。前者，“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赞赏西湖山水之美，在阴晴变化之中，更显示其千姿百态，妩媚动人；后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儿时休！”在赞叹西湖山水之美以及湖上清歌妙舞之美的同时，还流露了对南宋统治者沉缅于西湖景游和听歌赏舞的享乐偏安思想的谴责之意。

接着又引用了杭州“书会”才人写的两篇西湖词。《水调歌头》集中地描写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西湖景色。《临江仙》则全面地介绍了昭庆坛、放生池、苏公堤、林逋宅、雷峰塔、净慈、三天竺、二高峰、太子湾、佛国山、九里松、龙井山、西陵桥、六桥、断桥等西湖美景的不同特色。这简直是一幅生动、形象的西湖导游图。

而且,有时作者还以“说话人”的身份站出来直接对西湖加以盛赞:“景物非常”,“西湖好景”,“说不尽西湖佳景”,“果然景致无比”。有时甚至通过人物张顺在西陵桥上观赏了一阵西湖的“水色”、“山光”之后,心中油然而起了对西湖的爱慕之情:“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透过张顺的话,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那种按捺不住的对西湖的热爱之情。黄霖先生在《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一文中认为,《水浒》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临安、西湖,何其多情,盖临安为作者‘朝斯夕斯,休焉游焉’之故国都城是也!作者熟悉它、怀念它,就情不自禁地编写小说时进行了‘移花接木’。”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内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不仅是一位杭州人,而且还是一位热爱杭州、熟悉杭州的“杭州通”;施耐庵不仅是一位杭州书会才人,而且还是一位长期深入杭州市民阶层和民间艺人的一位书会才人兼通俗作家。可是,所谓王道生撰的《施耐庵墓志》中,却说什么《水浒》作者施耐庵不是钱塘人,而是江苏兴化人,只在钱塘做过两年官。兴化刘仲书于1919年曾在白驹施氏宗祠中,看到神主排位上写着“元至顺辛未进士任钱塘知县迁兴始祖施公耐庵之神主”。如果按照《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神主排位”上所写的那样,施耐庵不是长期生活在杭州的书会才人,而是只在杭州做过两年知县的进士,那就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任钱塘知县的两年里,即使施耐庵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化在接触杭州的“说话”艺术和“说话”艺人以及收集素材、熟悉生活、整理编撰上,也无论如何写不出《水浒》这部鸿篇巨著来的。

显然,所谓施耐庵在中了进士后,“曾官钱唐二载”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这也与杨新在《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上说的施

耐庵中了进士后“高尚不仕”的说法也是相矛盾的。据赵景深先生说，有关施耐庵的调查材料发表后，上海文联中就有人去调查过咸丰时的《兴化县志》和光绪时的《淮安县志》等，都找不到施耐庵的踪影，更不用谈“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了。甚至连刘冬先生也想给施耐庵中进士后曾在钱塘做过两年知县的论点找证据，结果刘冬先生查阅了《浙江通志》、《浙江府志》却一无所获。无独有偶，被刘冬先生说成是施耐庵中进士后曾官钱塘知县两载“铁证”的这块“元至顺辛未进士任钱塘知县迁兴始祖施公耐庵之神主”排位也不知去向了。原来这块“排位”和那篇“墓志”一样，纯属子虚乌有的伪证，哪里是什么“铁证”呢！至于施耐庵中进士之说，诚然，在《武林旧事》的“诸色伎艺人”的名单里，确有“陈进士”、“刘进士”、“陆进士”三位“进士”，但这都是“讲史”艺人的艺名，我想所谓施耐庵曾中进士的说法，恐怕又是张冠李戴和以假充真了。那么为什么要凭空编造施耐庵中了进士后曾在钱塘做过两年知县的说辞呢？这连刘冬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施耐庵不中进士，则不能做钱塘知县，不住杭州，就不能有‘武林施某’、‘钱塘施耐庵’的记录。’

### 杭州“水浒文化”的内涵之三：

#### 《水浒》成书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杭州

《水浒》成书的特点完全不同于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那样由作家曹雪芹个人创作的，而是由“说话”艺人、书会才人及小说作家集体创作的，故而《水浒》成书的特点与四大古典名著之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倒是相似的。也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是“说唱”阶段

早在《水浒》成书之前的宋元时代，在杭州如星罗棋布的游



艺场“瓦子”里，“说话”艺人已经把流传在杭州大街小巷的“水浒”民间故事编成“小说”《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石头孙立》等进行说唱了。这是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唱的草创时期。最先出现的便是以单个人物为主的英雄的短篇公案故事或战争故事。这些短篇的“小说”经过艺人长期的说唱，不断的锤炼，已成为相当成熟的艺术精品。后来，“说话”艺人又将这些写单个英雄的短篇“小说”，联缀成为写群体英雄的长篇“讲史”。《大宋宣和遗事》这部“讲史”在当时杭州的瓦子里说开之后，便受到了市民们的青睐。除了瓦子里说讲外，甚至有一位“腹笥有文史”的杭州专业艺人朱桂英在杭州郊外的渡船上说讲《大宋宣和遗事》。由于她的书艺不凡，竟使渡船上“座客倾耳耸听”。（杨维禎《东维子文集·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 第二是“话本”阶段

宋元杭州艺人说唱的“小说”《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石头孙立》等和说讲的“讲史”《大宋宣和遗事》，作为最流行最优秀的传统书目被杭州书会才人记录下来，并加以润饰，遂成为书面的话本。可惜的是这么多精彩的“小说”话本都没有留传下来，只在罗烨的《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条下保留了它们的书目。

有幸保存至今的《大宋宣和遗事》的“讲史”话本，它大约刊行于元代初年。书末结尾处题有“新镌平话《宣和遗事》终”这样的字样，因为至元代才改称“讲史”为“平话”。可见，这是根据元末杭州艺人说讲的《大宋宣和遗事》记录、整理的话本。原来“小说”时期单个英雄故事多聚合在这部长篇的《大宋宣和遗事》的话本里。所记梁山泊英雄故事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宋江受玄女天书、梁山聚义、宋江受招安平方腊等，从中可以看到《水浒》的最初面貌。郑振铎称《大宋宣和遗事》为“最初的